

“社会调查”的内与外： 思考早期社会研究的两种思路^{*}

田 耕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了西方早期社会调查的“内在”和“外在”状况，阐释了这两条线索背后的理论史的问题。本文认为，从西方社会调查的政治与社会处境的研究来看，将早期社会调查仅仅视为对社会失序的批判性回应，忽略了早期社会调查与国家理性以及与早期社会科学的复杂的关联。从西方社会调查在现代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来看，将早期社会调查视为通向专业化学科知识的一环，既忽视了所谓专业化的历史节点，也忽视了现代社会科学追求规范秩序的意涵，同时简化了社会科学形成过程中的知识生态的复杂性。本文最后简述了这两个思路如何可能与反思中国早期社会研究的工作结合起来。

关键词 早期社会调查 国家科学 专业化 规范秩序

19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陆续开始将实地调查 (social survey) 作为收集材料的新办法。实地调查的范围和规模，以及它所引起的中国学者的热情，都使其成为早期社会研究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即使是史论色彩浓厚的19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也在相当程度上和论战各方在农村的社会调查经历有密切联系 (钱俊瑞，1981；雷颐，1996)。社会调查的概念和手法并没有取得空前一致的认识，但其作为社会研究的“运动”却为当时学者所重视。^①早期中国的社会科学界通过调查，重建社会事实，并以此作为启发民智的基础，这一努力在一般思想史的观察中也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革命或现代化的组成部分 (李景汉，1932；Lam 2011)。

仰赖于社学家和学科史工作者在过去十数年间的努力，散落在不同机构和不同领域的20世纪上半叶社会调查开始逐渐呈现出它丰富的样态。^②一些社会学史的研

究者已经注意到了早期社会学在社会学整体学科品质形成上的重要意义 (杨雅彬 2001；姚纯安 2006；齐钊 2013；侯俊丹 2014)。近年来一些针对中国社会学开拓者的深入研究则进一步丰富了早期社会学的研究在思想史和社会史方面的含义 (朱浒，赵丽 200；吕文浩 2009；杨清媚，2010)。我们至少可以发现，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在科学救国之外的缘由亦多，所赖以施行的机构各不相同，最终实际操作的人员更是在学界内外都有。因此，要对它做一个清晰的判断，除了继续目前重要的文献整理工作，也非常需要我们对早期社会调查的理论史背景有所探讨。本文即从“内在”与“外在”状况来讨论早期社会调查的两个重要的理论史背景。在反思这两个理论史的过程当中，本文将重点阐释早期社会调查在西方社会理论和历史脉络中的变化。在上述脉络中，社会调查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调查 (social investigation) 其源起的思想 and 政治动力集中体现在古典政治经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实践的演变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BSH004)的阶段性成果。

济学的诸脉对人口与财富的关注。因而广义的社会调查有着更为丰富的理论史背景, 和社会理论在近代早期的关注点很接近。而狭义的社会调查(social survey), 专指工业革命兴起之后, 面对工业化对西方社会秩序的冲击这一主题的调查实践, 其发达大约和古典社会学同时, 在一战之后达到高峰。

一般的学科史与学术史研究强调欧美的早期社会调查在这一高峰之后消退: 一方面, 早期社会调查中的社会批判和改良色彩越来越难以被学院化色彩加重的知识生产所接受。另一方面, 早期社会调查的自发性的社区民族志也越来越被更为成熟的调查技术, 尤其是以统计推论为基础的调查取代。

本文认为上述观点对早期社会研究是一种简化的理解。本文的观点是, 早期社会调查在理论上的重要之处, 在于它和国家科学的密切关联, 也在“社会调查时代”促成了经典社会理论对“社会团结”这样整体问题的思考。更重要的是, 早期社会调查的规范意识(normative sense) 和社会科学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 而是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从时段来考虑, 是二战之后大型的应用类调查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及学院知识生产对之的反动, 才真正瓦解了早期社会研究和社会科学的规范共识。

下文的主干将分为两个小节。第一小节将从“外部状况”, 即社会调查与国家治理以及社会道德状况的关系来讨论早期社会调查的第一个理论史脉络。第二小节将从“内在状况”, 即社会调查在社会科学沿革中的意义和位置, 来检讨早期社会调查的第二个理论背景。本文最后将简单指出上述两个理论史背景对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早期社会调查所提供的一些可能的方向。

所谓社会调查的“外在”, 指社会调查是在何种社会关系里面发生的。就此来说, 关注社会调查“外在状况”的最重要的理论史主题之一即是其和政治治理的关系。重商主义时代的“治安国”理想中(police state), 人口之稳定与繁盛是国力最重要的象征, 因此社会调查的第一个稳定的形态, 是依赖教区和地方精英的人口调查, 对遭遇过三十年战争重大人口压力的德意志邦国来说, 更是如此。^③不过人口压力导致 17 世纪的德意志邦国在人口任务之外发展出合理性的调查和维系财政的技艺。这个技艺成为典型的重商主义时代的“治安科学”(Polizeiwissenschaft) 此后作为漫长的德意志的国家学说(Staatswissenschaft) 的前导。^④

在治安科学里面, 社会调查的前身都从对人口或者说“人力”的关注来到了经济的健康。人口成为了自然史的一部分(Schumpeter 1994: 233)。人力关乎的是具备不同的生产能力, 对不同的物品进行劳动的人的相互关系。但“人口”内的各个部分之间, 远非只是不同行当之间的分工和交换。不同的人口组成如何形成具有合意的整体早在威廉·佩第(William Petti) 时代就成为焦点(Buck, 1977: 78)。如何在对人口的调查里面获得不同人群的合意, 换个说法, 就是人口调查能用什么样的手段来使得人口获得一个新的有团结意义的主体身份。这是人口调查在 18 世纪末期开始成为国家建构手段的动力之一(Anderson, 1988; Patriarca, 1996)。

通过社会调查来掌握民情, 亦是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中所谓知情政府(informed governance/ knowing state) 的一部分。如我们在下一小节将讲述的那样, 在不列颠政治里面, 将社会调查视为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 从 18 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维多利亚时期(Collini et al., 1983: 18)。在这种社会改良意味浓厚的调查中, 社会调查实则是理智清醒的“立法科学”(science of legislation) 的一个组成部分(Winch, 1993: 65)。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理论传统, 透过托克维尔对民主制的深刻反思, 成为更具批判色彩的工业时代社会调查的基础思想(Drolet 2003; 崇明, 2008)。

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调查运动促成了“实地调查者”(fieldworker) 对特定社区或地方的深入描写取代了相关部门以“问询”(interrogatories) 取得的信息, 从而使得“人群的生活”成为调查的真正对象(Abrams, 1968: 18; Bulmer, 1991: 16)。但至此之后, 社会调查的两个层面开始出现分化: 专注于特定社区状况的社区民族志(community ethnographer) 和统计数据的提供。后者在 19 世纪中期仍集中由地方官员和机构掌控。对前者来说, 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展开, 改良论和道德统计式社会调查催生了大量亲无产阶级的专门调查, “志愿调查者”的视角开始越来越多的加入了劳资批判和阶级分析。^⑤但同时, 社会调查也从笼统的道德关怀分化为针对特定社会人群(如移民), 或是特定类型的社会组织(如法国的小家庭工业) 的更为专门和深入的调研(Yeo 2003: 91)。介于政府和纯粹志愿者之间的调查组织, 特别是以“统计”和“社会科学”为名的调查研究组织开始出现, 典型的例子是不列颠社会科学促进会的成立(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s, 1857 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后期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调查非常坚定地走向

了对特定地点和具体社区的整全的观察。其代表是布思 (Charles Booth) 于 1886 年开始在伦敦针对贫困、越轨和犯罪进行的调查 (Booth, 1903; Cullen, 1975; Goldman, 2002)。布思说得很明白, 这样的调查虽然强调田野工作, 力图在“个人道德”之外找到精确量度贫困这一“社会事实”的办法, 它仍然是道德改良的一部分, 和历史或系统地分析产生贫困的社会过程的“社会”分析有本质区别。

对比上述两个和近代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渊源颇深的主题, 其中非常有趣的现象是, 当人口和社会调查走出了早期的人口定律, 不将人力视为自然史的一部分, 而是具有高度文化性质的时候, 将人群类分为不同的范畴越来越发达, 也越来越成为独立于被调查人口的“客观范畴” (Donzelot, 1988; Steinmetz, 1993; Joyce, 1994)。早期社会调查希望通过对社会的“知情”而建立新的国家主体的想法, 在高度工业化的现实中遭到了极大的反动。^⑥

事实上, 社会调查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上述从缔造合意到社会撕裂的反转的进一步发展, 佩第的预言没有过时, 工业时代的社会调查是狭义的, 也被认为是典型的早期社会调查。而这个今日还在社会科学年代记上留下记忆的“社会调查时代”, 恰恰是因为它催生了更深的社会分裂, 也为社会思想考虑团结留下了最深的震动。对西方早期的社会调查来说, 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病” (Social Question) 是核心。

“社会调查时代”在西洋社会史上的核心是围绕贫困的工人阶级 (working poor) 所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 (Campbell, 1995; Calhoun, 1996; McGerr, 2003; Yeo, 2003: 88)。与此相应的是, 大量旨在阻止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秩序崩坏的社会改良 (social engineering) 项目开始出现 (Danbom, 1987; Lasch - Quinn, 1993; Flanagan, 2007: 9)。这些社会改良的项目针对特定的社会问题进行调查, 宣传, 并在此基础上酝酿重建社会秩序的方案。这些旨在帮助社会重建的改良项目催生了针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专门调查和民族志式的社区观察 (community ethnography), 这成为世纪之交欧美早期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动力 (Abrams, 1968: 44; Horne, 2001: 18)。

表面上, 社会问题催生的社会调查的“专门化”代表着早期社会科学的学术论点和社会研究实践的密切结合。这一结合, 直接反映在 20 世纪初期的各项社会政策上面。^⑦“社会调查时代”的旗帜之一, Russell Sage 基金会大量社会重建项目的努力就是其中的一例子 (Anderson, 2008)。许多社会调查不仅大大扩展了经验研究的深度, 使得原本较为笼统的劳工问题在社会调查当中开始

形成了和工业社会紧密相关的一系列研究主题。这一系列调查的进行, 反映的不仅是调查传统的继续, 也反映了 19 至 20 世纪初期的欧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在后来编的六卷《匹兹堡调查》文集中 (Pittsburgh Survey), 由费齐 (John Fitch) 进行的针对钢铁工人调查的项目, 就深深地体现了制度经济学 (所谓的威斯康星学派) 对经济组织和劳工组织关系的认识。^⑧ 费齐对阿里戈县 (Allegheny County) 的钢铁工人 (尤其是其中的欧洲裔移民工人) 的生活境况的“深描”, 他对早期调查发展出来的借助家庭账簿进行生活调查的熟悉, 以及书中随处可见的对劳资矛盾的回应, 使得这一社会调查有充分的理由进行我们所熟知的工业资本主义批判。但是费齐的论证却非常明显地将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后果放在了集体人格和行动中 (corporate action) 去理解, 而不是仅就劳工问题展开社会批判。全书社会学的核心是工会组织为什么会在钢铁业工人当中失败 (failure of unionization)。^⑨ 这个充满了有意思的组织观察的社会调查, 正如他在书稿一开始所说的那样, 不只是关于“劳工问题”的调查, 不惟关乎“工作时间和工资”, 也超越了“雇主和工人关系”的问题, 而是对民主制原则的一个考察 (Fitch, 1989: 3)。就此意义上, 进步主义时代的调查及与其密切合作的早期社会科学, 实则是托克维尔时代的“社会问题”研究的继承者。

也就是说, “社会调查时代”并不是一个不成熟的社会科学纠缠在学院之外的世俗 (mundane matters) 的时代。准确地说, 社会调查标志着社会科学对规范性 (normativity) 问题有着独特思维和实践的时代。如何检讨这个时代及其思考的规范性问题, 这是“内在地”思考社会调查需要面对的问题。

二

内在地看早期社会研究, 其实践者看待社会世界的知识主张是学者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对西方社会科学来说, 截止于维多利亚时代 (Victorian times), 乃至大西洋两岸的进步主义 (Progressive Era) 时代的早期社会科学, 是漫长的“早期现代”科学与思想史的一个晚期的组成。^⑩ 学科史和思想史学者的关注焦点之一, 在于社会调查的认识论奠基, 特别是其对经验事实的陈述以及分析。社会调查者对将“事实”从其生长的社会环境中剥离出来的手段成为知识主张的关键。需要注意的是, 总体来看, 知识主张向来是思想史和科学史学者对近代早期之后的社会认知 (social epidemics) 的一个重点。^⑪ 但 20 世纪前期的社会调查所体现的精神, 并不完全是工业时代的“事实

至上”,也包含了社会调查的先行者(Frédéric Le Play)身上的那种观察社会之法(méthode d'observation)的道德旨趣(Pitt,1988;Liebersohn,2003)。作为早期社会研究的代表,这种着眼于社会疾患,乃至像黎伯勒那样钟情于传统社会形式的调查更容易被放入到学科演进的轨迹里面去看。不过,“社会调查时代”事实上终结了黎伯勒这样的保守主义的理想(Lazarsfeld,1961)。

社会调查一向在西方的社会科学历史中被视为重要的纷争阶段和分水岭(Horn,1994;Anderson and Greenwald,1996;Horne,2001)。充满社会批判和呼吁社会改良的“调查道义”(investigative morality)在社会调查运动中存续,但最迟在两战之间,要求更冷静的,实事求是地看待社会问题的“科学化”呼声同样在这一波运动中崭露头角。最终,以“科学”为目标的“专业化”占据了上风,促使社会科学进入了学院化的时代(Bateman,2001;Bannister,2008:335-336)。

所谓的专业化,一方面是调查手段的问题,即要求更为系统的社会数据的获取方式和更少偏见(impartial)的测量手段。另一方面,是学院,或准确地说大学来主导可信的调查。在“专业化”的观点看来,社会调查在两战之间走向“科学测量”的趋势和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开始更严格地区分世俗和道德领域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在20世纪初之后的革命性变革之一,是将现代大学建立之初的道德关注从研究与教学的体系中逐步边缘化(Reuben,1996:135-155;Gieger,2004)。而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却越来越依靠大学提供的专业化来进行知识生产。这就决定了以“社会调查”为代表的道德批判意识浓厚的早期社会学必须走向科学化。

在检讨早期社会调查的“内在性”的思路里面,专业化的命题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早期的社会学研究者并不认为淡化或者摒弃对“工业化社会”的道德批判是将社会学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学研究”的根本特点。^⑫强调大学的主导地位和学科化,乃至学院知识的优越并没有使得社会科学对规范性问题的意识有根本的排斥(Platt,1996:150-154)。与此同时,如我们在费齐的钢铁工人调查中所看到的那样,社会调查的道德感具有非常的变动性和历史感,而促成这些变化力的来源之一恰恰是学院知识。也就是说,上述专业化的思路在于简单地看待了学科知识和规范性(道德意识)问题之间的关联。将“道德感”仅仅视为反智的社会批判(anti-intellectual social critique)。因此这一观点简单地认为学科,学院在知识生

产中的上升一定会取消规范问题在学科中的地位,而使得社会科学远离“道德”。

因此,今天我们回头检讨早期的社会研究的各种实践,核心问题不是“求事实”和“规范”之间的对立,而是理解社会科学的“规范”意识,包括体现在劳工研究等“批判性调查”中的道德感。从学术史“断代”(periodization)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早期社会调查的终结,并不在进步主义的结束,而是二战之后研究性大学的一系列变化。战后大学和社会研究的什么变化真正改变了早期社会调查中的规范意识呢?

实质性的变革在于二战之后的大型社会调查机构(research entrepreneur)在大学中的兴起,以及大量的针对应用研究的资金从国家进入到研究型大学(Kleinman,1995:100-145;Geiger,2004:265)。表面上,形成于战时气候的大型研究机构非但不能自然地融入到研究型大学的科系架构当中,它科层制架构明显,极耗人力的组织架构还相当强烈地引起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不满,将之视为大学“官僚化”的最紧迫动力。^⑬

非常反讽的是,尽管学者们早已担心上述变化会使得大学追求学术的自主向研究资本低头(Gouldner,1971:444-445;Ross,1990:429),但这最关键的变化在于系科在这个变化面前,以形式化的“道德中立”来平衡和对抗这个二战之后的变化。^⑭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是在几乎彻底科学化的大型社会调查开始深入社会科学的生产之后,才“后知后觉”地认为标榜“价值中立”可以拯救学术自主,并维系社会科学的学科边界(disciplinary boundary)。因此,并不是科学化,而是学科这种自我纯洁式的“价值中立”彻底切断了早期社会科学的规范性的思路。但其背后,恰恰是社会科学最没有韦伯所谓的“理智清明”(韦伯,1998:43-45),而在价值判断力最为纷杂的时代。在19世纪中期已经开始分道而行的统计(推断)型的调查和社区民族志至此更明确地一分为二。后者相当程度上认为自己的“规范性”完全建立在前者不具备的对权力系统的怀疑与批判,以及对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的深刻观察(Goldthorpe,2000:第四章)。“专业化”在学科史研究中的广布今日仍然如此,指出其背后的假设,以及这段往事,也许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对中国早期社会研究的整理会有些启示。

从时间上看,社会调查运动和民国学界内外对各地的省县方志的搜求热有相当的重叠。^⑮事实上,20世纪前期社会调查的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乡土志或风土志,其目的是为撰写新的地方志作准备。^⑯方志之热,除了对旧

志的搜寻,考证和重印之外,也相当程度上使社会调查研究者相当清楚原有的方志体例并不能给出中国社会在辛亥革命后的基本形态。^{①7}而中国的社会调查时代,实则是早期社会研究者在实地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地方”(locale)的时代。这种长时段历史中形成的特点,构成了调查者自觉或不自觉意识到的最鲜活的中国社会的传统。也使得20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调查具有浓重的当代史意味。事实上,吴景超盛赞李景汉的名作《定县社会调查》的原因之一,在于后者以社会调查为重写地方志找到了新路(吴景超,1933)。而杨堃对李景汉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一书在肯定之余的批评,着眼点也在“定县调查”要应对中国这个礼俗社会的问题,基础还是窄小了些(杨堃,1991:35;吕文浩2007)。

就此来说,社会调查无疑属于变革密集的晚清民初重新发现“社会”的历史。它作为认识种种社会改良和革命的前提,与重新发现20世纪前期的“社会团结”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社会调查对社会团结的发现大略集中在心态(mentality)和组织(organization)的方面。^{①8}在这两个面相上,社会调查的研究者一方面描述了传统社会组织方式的遗迹,乃至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传统中国社会持有的力度揭示出来。另一方面,社会调查试图跳出一方风土的文字,以新的语言来记录社会的变化。社会调查描述的新旧心态与制度,构成了就此来说,社会调查贡献的概念和心态,是跳出“西方冲击论”和“在中国发现历史”争论的一个天然的手入点。理论地观之,接下来的学术史和思想史考察,无论是就专门关注社会调查而言,还是广泛地看待晚清民初的早期社会研究实践,都需要仔细梳理20世纪前期社会研究者发现中国社会的过程。^{①9}

在理论的考察之外,从机制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分析接受和实践社会调查的行动者(调查研究者)及其组织基础有何异同。20世纪上半叶的学者对中外的学术传统都有着非常关键的继受,在继承和转换中形成的学术路径的差别,一向是认识此一时期中国学术的观察点,社会调查也不例外。从事社会调查的学者不仅对经验事实的观察有不同,对如何研究这些社会问题,以及调查研究这些问题何以构成新的学问都有非常不同的理解。这些调查者之间的异同,以及彼此的纷争与合作,可被视为学术生态(intellectual ecology)内的关系,将这一生态之内组织(无论是建制性的学术组织,如大学,还是依附于其他机构,较为临时性的社会调查机构)与研究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是知识社会学的入手点之一。学术史研究中随处可见的学科形成和学派传承研究某种程

度上都是研究学术生态的产物。^{②0}

社会调查在学者、机构与(临时性的)组织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网络。即使以社会调查运动中最为人熟知的燕京大学为例,通常所说的“社会调查运动”主要包括许仕廉、杨开道、李景汉、赵承信等中国学者主持的一系列开创性的调查。^{②1}但参与这场“社会调查运动”的许多重要学者都知道乃至亲身参与过之前由外国学人和社会组织(以传教机构和教会大学为基)进行的社会调查。^{②2}而且,即使在中国学者广泛开展社会调查之后,外籍学人依托上述组织进行的社会调查仍在进行(赵晓阳2016)。那么,在重合的时空内进行的社会调查,由“社会调查自觉”驱动的社会调查和自传教机构的深入实地传统延续下来的社会调查之间的异同是什么?在不同的调查机构,参与过不同类型的社会调查的学者,他们基于调查的作品有何不同?在不同性质的高等教学或教育组织(比如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以及类似中央研究院这样的专事研究的机构)从事的社会调查,异同又是什么?^{②3}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进一步考虑社会调查,乃至早期中国社会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结 语

在前文中,我们简要讨论了从外在状况和内在状况理解早期社会调查的主要思路。就其外在状况来说,包括社会调查在内,早期社会研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越来越难将社会调查作为当时整体社会事实的一部分,而不是社会疾患的一种来表述。就内在状况来说,早期社会研究的实践和那时社会科学的关联,为社会科学的规范性表达提供了独特的借鉴。在这两点意义上,我们会发现,作为早期社会调查同时代人的涂尔干在著名的《社会分工论》二版序言中提出的重建社会团结的方案,实则是当时的少数派(涂尔干2000:30页以下)。回到上一小节提出的问题,如果社会调查内在的规范性并不能靠“专业化”和“典范转移”来决定,那么何以真正认识社会调查的规范基础呢?笔者以为,这是今天重新检讨中国早期社会研究仍要直面的问题,而且需要专门持续的研究。

①参见李景汉(1936)。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刘育仁在他的学位论文《中国社会调查运动法》(1936)中则估计中国的社会调查在1927至1935年间成为气候。

②人民大学历史系和清史所的历史学者们在李文海先生的牵头下陆续出版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系列开近期整理社会调查资料的先声,如《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汇编》(2013)等,基本上延续了这一体例。

③治安科学的“Polizei”源于Politeia,但是在“治安科学”中的

“多数”指的是被视为政治力量来源的“人口”具有多种多样的构成,怎么区分人口的构成继而使得每一部分有合适的配置去发挥其生产的力,是这种治安科学在近代早期历史中的一个核心的意义,参见 Hacking(1987),Foucault(2007: 313)。

- ④此一时期的“治安科学”狭义上只是为了邦君准备有效的财政而组织起来的具备应用性的学说,对象是被视为君主私有物的封地和人口,以及君主(含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为了众人的利益的执政。而不涉及其他被视为现代经济对象的物产,比如林地、矿产等,因此有学者将其视为行政学的早期形态,参见 Lindenfeld(2005: 6)。字面上说,“治安科学”只是“枢密学”(Camerarism)的一种组成部分。但正是在这种起源于君主或王室利益的学说体系中,对社会情况的掌握成为政治实践中核心的技艺,统计人口与财税的学说在18世纪之后成为德国大学中的正式教席,参见 Lindenfeld(2005: 17-18)。“枢密学”的思想意义早在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代任务斯莫(Albion Small)那里就受到高度重视,他将其定义为围绕君主的财政安全而建设起来的学说汇纂,参见 Small(1909: 6)。
- ⑤产生于1840年代的梅休的(Henry Mayhew)的城市贫困调查和恩格斯在1840年代写就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这方面的代表,参见 Thompson and Yeo(1971)编写的梅休的文集。
- ⑥与此相应,通过调查建立区分社会中的不同人群范畴也越出了西洋社会而深刻影响了19世纪的欧洲国家与海外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这个过程和后果,也是史学家和知识社会学家分析权力的重要领域之一。盛行于殖民地的人口统计、族群分类和制图术(cartography)等调查手段,不仅重新塑造了殖民帝国的权力技术,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性反抗,也反过来对西洋的现代国家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一主题多少超出本文的范围,值得专门的讨论。可参见 Cohen(1996)和 C. A. Bayly(1996)。
- ⑦可参见 Moss(1996)对劳工保险政策的研究。
- ⑧这是费齐计划中的涵盖六个州的钢铁业和钢铁工人调查的一部分,原本的课题叫做《大型经济产出中的人: 美国六州的钢铁业和钢铁工人》(“The Human Side of Large Output: Steel and Steel Workers in Six American States”)但完成的调查只有一个。
- ⑨费齐对劳工的工会组织失败作为一个组织过程来理解。在这一过程的初期,相对于卡内基这样的资方缺乏大企业之间的合作的时候,工会组织的确具有某种动员优势,参见 Fitch(1989: 90页以下)。这一论点如何和制度经济学的威斯康星学派关系起来,参见 Stryker(1990)。
- ⑩这方面代表性的科学史研究可参阅 Porter(1995)。
- ⑪这个形象的高峰,是狄更斯在其名著《艰难时世》(Hard Times)当中写作的 Behold Gradgrind,一个毫不动摇地要求“事实”的顽固的普通人。另可参见 Poovey(1998); Shapiro(2000)。
- ⑫参见 Abbott(1995a),此一论文和他同年发表的另一标题类似的文章(Abbott 1995b)基本关怀相同,即特定专业对社会研究之合法性的掌握,是在和其竞争者的角力中取得的,其结果未见得是在科学化方向上专业化。
- ⑬外交史家小史莱辛格对创作出《美国士兵》(American Soldier)的研究方式极为不满。他在写给本书的书评里面抱怨本书开启了“对跨学科的拜物教”(“the fetish of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s”)而且警告说如果这类研究方式的繁衍将会实现对美国精神生活的科层化(转引自 Converse, 1987: 255),另参见 Converse(1987: 244-248)。

- ⑭简而言之,并不是大型研究机构强大的应用能力和财政支援压迫传统的学科向其靠拢,相反,就研究资源上,二者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是界限清楚的,参见 Platt(1996: 162-170)。
- ⑮民国时期对“旧”方志的热大约起于1915年前后清史馆为修清史而进行的方志搜求,参见张升(2004)。
- ⑯许多此类调查报告,收入了《中国罕见地方史料集成》第一辑(2010)第二辑(2012)当中,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 ⑰典型的例子是民国十四年至二十一年(1925-1932)之间编写的涉及当时青海省14个县的风土调查报告。“风土调查”报告与旧方志相比,突出的变化在对地方族群、宗教和文化习俗的重视上,而上述方面恰好是旧志书写的极薄弱的方面。上述报告曾收入“青海风土概况调查集”这一资料汇编(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后其中的国家图书馆藏本又被收入“乡土抄稿本选编”(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辑,北京线装书局,2002)。
- ⑱这方面的经典著作之一,参见费孝通1933年在燕京大学的本科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收入费孝通(1999: 第一卷)以及赵旭东、齐钊(2012)的研究。
- ⑲这就多少设计学科史研究常见的“本土化”问题。此一问题非常值得在中国学术近代的嬗变中进行专门研究。此处需要强调的是,本土化的观点描绘了学术传统转移的动力和社会情景。但很容易将本土化的动因化约为各种“社会例外论”:即学术典范本土化是因为该国社会难以被老传统或域外传统所认识,从而产生了修正既有典范,乃至批判背后的文化霸权和种种中心论的做法。例如,在进步主义时代美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核心命题是美国作为一个走向工业化的年轻民族,如何最大可能地避免老工业民族(西欧诸国)所经历的衰颓以及社会秩序的坍塌。而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美国学者当中,许多都有着从欧洲大学留学的经历,本土化社会科学的命题,首先成为这一代美国学者承担的任务,参见 Herbst(1965); Ross(1990); O'Connor(2001: 1-2章)。这一观点最大的问题是忽视了“本土化”学者有着非常强的化“陌生传统”为自身文化构成,从而再造文明的动力和眼光,而不是保存一个自然史意义上的独一无二的文化标本。
- ⑳在中国的早期社会研究中,此中最关键的“学派”差别,是为“社会调查”派和“社区研究”(或曰社会学的调查)派之间的差别,参见 Chiang(2001),黄兴涛、夏明方(2008)。
- ㉑参见本期侯俊丹文。
- ㉒李景汉先生的《乡村社会调查大纲》即是在和长期在华北调查的甘博合作而成,参见李金铮(2008)。
- ㉓王利平讨论了机构的差别对民国关于“国族”的学派之争的作用,参见王利平(2016)。关于民国教会大学在学科用力上的不同,可参见 Yeh(1990)。

参考文献

1. 崇明《民主与社会改革: 托克维尔论社会问题》,《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2. 费孝通《亲迎婚俗之研究》,《费孝通文集》第一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57-212页。
3. 雷颐《“中国农村派”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近代史研究》1936年第2期。
4. 侯俊丹《新史学与中国早期社会理论的形成——以陈黻宸

- 的“民史”观为例》，《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
5. 刘育仁《中国社会调查运动法》，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论文，1936年。
 6. 李金铮《定县调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7. 李景汉《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社会学界》1927年第1卷。
 8. 李景汉《社会调查在今日中国之需要》，《清华周刊》1932年第38卷第7-8期合刊。
 9. 吕文浩《民国社会学家视野中的“社会调查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7卷，第366-388页。
 10. 吕文浩《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
 11. 齐钊《社区·区域·历史：理解中国的三种进路——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术传统与研究特色的再分析》，《开放时代》2013年第6期。
 12. 钱俊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84辑。
 13. 涂尔干《第二版序言》，《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14. 王利平《知识人、国族想象与学科构建：以近代社会学和民族学为例》，《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3期。
 15. 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学术演讲》，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16. 吴景超《中国县志的改造》，《独立评论》60号，1933年7月23日。
 17. 杨堃《评李景汉著〈实地调查方法〉》，《杨堃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29-37页。
 18. 杨清媚《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
 19. 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20. 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21. 张升《民国时期方志搜求热考述》，《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2. 赵晓阳《寻找中国社会生活史之途：以燕大社会调查为例》，《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23. 赵旭东、齐钊《地方志与风俗的区域研究：对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两篇毕业论文的分析》，《民俗研究》2012年第2期。
 24. 朱浒、赵丽《燕大社会调查与中国早期社会学本土化实践》，《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25. 黄兴涛、夏明方主编《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
 26. Abbott, Andrew. 1995a. “Boundaries of Social Work or Social Work of Boundaries”, *Social Service Review*, 69(4): 545 - 562.
 27. Abbott, Andrew. 1995b. “Things of Boundaries”, *Social Research*, 62(4): 857 - 882.
 28. Abrams, Philip. 1968. *The Origins of British Sociology, 1834 - 1914: An Essay with Selected Pap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9. Anderson, Elisabeth. 2008. “Experts, ideas, and policy change: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and small loan reform, 1900 - 1941”, *Theory and Society*, 37: 271 - 310.
 30. Anderson, Margo J. 1988. *The American Census: A Soci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31. Bannister, Robert C. 2003. “Sociology”, pp. 329 - 353,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VII: *Modern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Theodore M.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2. Bateman, Bradley W. 2001. “Make a Righteous Number: Social Surveys, the Men and Religion Forward Movement, and Quantification in American Economic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3: 57 - 85.
 33. Bayly, C. A. 1996. *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 -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4. Booth, Charles. 1903. *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 London: The Macmillan Co.
 35. Buck, Peter. 1977. “Seventeenth - Century Political Arithmetic: Civil Strife and Vital Statistics”, *Isis*, 68(1): 67 - 84.
 36. Bulmer, Martin. with Kevin Bales, and Kathryn Kish Sklar. 1991.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80 - 19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7. Calhoun, Charles W. 1996. *The Gilded Age: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Modern America*.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38. Campbell, Ballard C. 1995. *The Growth of American Government: Governance from the Cleveland era to the Prese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39. Chiang, Yung - Chen. 2001. *Social Engineering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 - 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0. Cohen, Bernard. 1996.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 of Knowledge: The British i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1. Collini, Stefan, Donald Winch, and J. W. Burrow. 1983. *That Noble Science of Politics: A study in nineteenth - century intellectu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2. Converse, Jean. 1987.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Roots and Emergence, 1890 - 19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3. Cullen, Michael J. 1975. *The Statistical Movement in Early Victorian Britain: The Foundations of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Harvester Press; Barnes & Noble.
 44. Danbom, David B. 1987. “The world of hope”: Progressives and the struggle for an Ethical Public Lif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45. Donzelot, Jacques. 1979. *The Policing of Famili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46. Drolet, Michael. 2003. *Tocqueville, Democracy, and Social Refor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47. Fitch, John A. 1989. *The Steel Worker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48. Flanagan, Maureen A. 2007. *America Reformed: Progressives and Progressivisms, 1890s - 192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9. Foucault, Michel. 2007.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 - 78*. New York: Palgrave

- Macmillan. Lectures 3 – 5; 10 – 13.
50. Geiger, Roger L. 2004. *To Advance Knowledge: The growth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1900 – 1940*.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51. Goldman, Lawrence. 2002. *Science, reform, and politics in Victorian Britain: The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1857 – 18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2. Goldthorpe, John. 2000. *On Sociology: Numbers, Narrativ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nd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3. Gouldner, 1971.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54. Greenwald, Maurice, and Margo J. Anderson. 1996. *Pittsburgh Surveyed: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Refor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55. Hacking, Ian. 1987. “The Prussian Numbers” in Krüger et al. *The Probabilistic Revolution, Vol. 1: Ideas in History*. Cambridge: MIT Press.
56. Herbst, Jurgen. 1965.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in American Scholarship: a Study in the Transfer of Cultu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57. Horn, David G. 1994. *Social Bodies: Science, Reproduction, and Italian Modern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8. Horne, Janet R. 2001. *A Social Laboratory for Modern France: The Musée social and the Rise of the Welfare Stat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59. Joyce, Patrick. 1994. *Democratic Subjects: The Self and the Social in Nineteenth – 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0. Kleinman, Daniel L. 1995. *Politics on the Endless Frontier: Postwar Research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61. Lasch – Quinn, Elisabeth. 1993. *Black Neighbors: Race and the Limits of Reform in the American 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 1890 – 194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62. Lazarsfeld, Paul F. 1961.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Quantification in Sociology—Trends, Sources and Problems”, *Isis*, 52 (2): 277 – 333.
63. Liebersohn, Harry. 2003. “Scientific Ethnography and Travel, 1750 – 1850” pp. 100 – 113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VII: Modern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Theodore M.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4. Lindenfeld, David. 2005. *The Practical Imagination: The German Sciences of Sta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5. Moss, David. 1996. *Socializing Security: Progressive – era economists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poli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6. McGerr, Michael E. 2003. *A fierce disconten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in America, 1870 – 1920*. New York: Free Press.
67. O’ Connor, Alice. 2001. *Poverty Knowledge: Social science, social policy, and the poor in twentieth – century U. S.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8. Patriarca, Silvana. 1996. *Numbers and Nationhood: Writing statistics in nineteenth century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9. Pitt, Alan. 1988. “Frédéric Le Play and the Family: Paternalism and Freedom in the French Debates of the 1870s”, *French History*, 12 (1998), 67 – 89.
70. Platt, Jennifer. 1996. *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in America: 1920 – 196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1. Poovey, Mary. 1998.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fact: Problems of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s of wealth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2. Porter, Theodor. 1995. *Trust in Number: 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Science and Public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3. Reuben, Julie A. 1996.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mor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4. Ross, Dorothy. 1990.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5.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1994.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Part IV*.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6. Shapiro, Barbara. 2000. *A Culture of Fact: England, 1550 – 172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77. Small, Albion. 1909. *The Cameralists: The Pioneers of German Social Po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8. Steinmetz, George. 1993. *Regulating the social: The welfare state and local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9. Stryker, Robin. 1990. “Science, Class and the Welfare State: a Class – Centered Functional Accou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 684 – 726.
80. Mayhew, Henry. 1971. *The Unknown Mayhew: Selections from the Morning Chronicles, 1849 – 1850*. Edited by E. P. Thompson and Eileen Yeo. Merlin Press.
81. Winch, David. 1993. “The science of the legislator: the Enlightenment heritage”, pp. 63 – 93, in Michel Lacey and Mary Furner eds. *The state and social investigation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2. Yeo, Eileen. 2003. “Social Surveys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pp. 83 – 93,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VII: Modern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Theodore M.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3. Yeh, Wen – Hsin. 1990.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 – 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田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 毕素华)